

責任編輯 俞 笛 李 斌
版式設計 彭若東
封面設計 吳丹娜

書 名 國史概要（插圖修訂本）
著 者 樊樹志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 4 樓 A 室
版 次 2017 年 9 月香港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16 開（178 mm × 254 mm）512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4045-8
© 2017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目錄

導言8

一・史前史與傳說時代

1．古人類的起源.....13

2．石器時代17

3．史前文化的各種類型——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化20

4．炎帝、黃帝與傳說時代24

二・夏與商——歷史時期的開端

5．世界文明史上的中華文明31

6．探索中的夏文化35

7．從“大同”到“小康”39

8．商的起源與盤庚遷殷43

9．青銅時代47

10．商文明：甲骨文，宗教觀念，科學52

三・西周與春秋——Feudalism 時代

11．周的起源與周朝的建立57

12．周公“制禮作樂”60

13．“封邦建國”與宗法制度64

14．農村公社與井田67

15．春秋時代的列國爭霸70

16．步入鐵器時代	75
17．老子與孔子	78

四・從戰國到秦——大一統中華帝國的建立

18．各國的變法	85
19．百家爭鳴：群星燦爛的時代	89
20．秦的大一統及其地理基礎	95
21．秦始皇：皇帝與中央集權體制	99
22．秦始皇陵與“兵馬俑”	102
23．徐福東渡之謎	105

五・西漢與東漢——帝國規制的完備化

24．大一統帝國的重建	109
25．黃老思想與文景之治	113
26．漢武帝：中央集權體制的強化	116
27．“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119
28．王莽託古改制	123
29．光武中興	127
30．清議與太學生運動	131
31．The Silk Road ——絲綢之路	133
32．小農經濟的發展	138
33．科學技術新成就	142

六・三國與兩晉——統一王朝消失的時代

34．從東漢末的割據到三國鼎立	147
35．曹操與諸葛亮	152
36．西晉：從“禪讓” 故事到“八王之亂”	156
37．東晉：北伐與偏安	161
38．魏晉風度與玄學	164

七・北朝與南朝——走向再統一

39．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漢胡互化	171
40．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的改革與漢化	175
41．均田制與府兵制	180
42．門閥政治	185
43．藝術與科學	191

八・從隋到盛唐——統一王朝的再建

44．隋的統一與創制	197
45．隋的“國富” 與“國祚短促”	201
46．唐太宗與貞觀之治	208
47．從武則天到唐玄宗	213
48．盛唐氣象	219
49．佛教的全盛時代	226
50．長安：東西方文明的交匯	230

九・從唐的衰落到五代十國的割據

51．由盛轉衰的各個側面	239
52．安祿山與全盛時代的消失	243
53．劉晏與楊炎的財政改革	247
54．宦官與黨爭	251
55．黃巢與唐朝的土崩瓦解	255
56．五代更迭，十國割據	259
57．從柴榮改革到趙匡胤統一	265

十・北宋——劃時代的新階段

58．趙匡胤與北宋的官僚政治	271
59．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	275
60．“田制不立” 與井田限田論	281

61 . 傳統農業的新發展	286
62 . 巔峰狀態的科學成就	291
63 . “商業革命” 面面觀	296
64 . 契丹的興起與遼的二元化體制	303
65 . 党項羌與西夏	306
66 . 宋對遼、西夏的妥協	309
67 . 女真的興起與遼的滅亡	312

十一 . 南宋與金的對峙時期

68 . “靖康恥” 與岳飛抗金	317
69 . 金朝統治下的北中國	324
70 . 舉棋不定的和與戰	327
71 . 經濟重心南移的最終完成	330
72 . 朱熹新儒學及其學派遭禁錮	336
73 . 民族危難時期的文化界	339

十二 . 元——蒙古建立的王朝

74 . 蒙古的興起與成吉思汗	345
75 . 混一亞歐的大蒙古國	349
76 . 蒙古對中國的統治——元朝	353
77 . 勸課農桑與“棉花革命”	358
78 . 匠戶，斡脫，鈔法，漕運	363
79 . 對外交往的擴大	367
80 . 郭守敬與關漢卿	372

十三 . 明——中華文明的餘暉

81 . 朱元璋：從遊方僧到開國皇帝	379
82 . “胡藍之獄” 與皇權的強化	385
83 . 航海史上的壯舉——鄭和下西洋	389

84 . 海上走私貿易與倭寇	394
85 . 商品經濟的高水平發展	399
86 . 耶穌會士與早期“西學東漸”	404
87 . 正統思想與異端思想	411
88 . 張居正與萬曆中興	416
89 . 從東林到復社	421
90 . 崇禎：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	427

十四 . 清——末代王朝的興與衰

91 . 清軍入關與南明抗清運動	433
92 . 康熙之治	437
93 . 雍正：“為治之道在於務實”	443
94 . 八旗，議政王大臣會議，軍機處	448
95 . 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	452
96 . “夕陽無限好” —— 康雍乾盛世	457
97 . 文化專制與文字獄	463
98 . 乾嘉學派	468
99 . 從海禁到閉關	473
100 . 人口壓力與社會危機	479

附錄 歷代帝王建元簡表	485
--------------------------	------------

後記	505
-----------------	------------

插圖修訂本後記	507
----------------------	------------

導言

什麼是歷史？

這是一個既簡單而又複雜的問題。給歷史下定義，就好比給文化下定義，可以有五花八門的說法。

不妨看看大師們是如何說的。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說：“歷史是勝利者的宣傳。我本人是經常意識到有必要降低勝利者宣傳的重要性。”此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太過於情緒化，失之偏頗。

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說：“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問答交談。”這種說法，與荷蘭歷史學家蓋爾（Pieter Geyl）所說“歷史是一場永無休止的辯論”，同樣不失機智與精闢。卡爾如此解釋他的觀點：只有借助於現在，我

們才能理解過去；也只有借助於過去，我們才能充分理解現在。此話言之有理，蘊含着相當深刻的哲學思辨，但作為歷史的定義，似乎不能令人滿意。

於是，只能求助於學究式的定義。《大英百科全書》（1980 年版）說：“歷史一詞在使用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含義：第一，指構成人類往事的事件和行動；第二，指對此種往事的記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指實際發生的事情，後者是對發生的事件進行的研究和描述。”這個定義說明了歷史與歷史學的聯繫與區別，無疑是正確的。

在古希臘文中，“歷史”最初的含義是詢問或調查，後來引伸為“作為詢問結果而獲取的知識”。顯然這是上述定義中的第二含義。比利時歷史學家皮朗（Henri

Pirenne）說：“歷史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社會在空間和時間上的發展”。把歷史的雙重含義包含在一起，“人類社會在空間和時間上的發展”指的是歷史自身，而對“人類社會在空間和時間上的發展”的描述、研究，便是歷史學。

這些明白淺顯的道理，到了“後現代”的歷史學家那裡，就變得複雜多了，因為他們不滿足於淺表層次的理解。

當代美國學者凱利（Donald R.Kelley）在《多面的歷史》（*Faces of History*）一書中說：歷史作為一個術語和概念，在歐洲人看來，是希臘人的產物，當然這並不是否認在有文字之前（Ante Litteram）就已存在歷史實踐，我們進入了各種觀念詮釋和利益互相衝突的危險地帶。困難產生於“什麼是歷史”這一問題。他接着指出：歷史的時空是無限的。那麼，歷史探詢的本質又是什麼呢？另外，豐富的形形色色的人類經驗為歷史學家從事職業提供了材料，用泰倫斯（Terence）的話來說，對於人類歷史學家而言，“沒有什麼是陌生的”。此外，似乎存在着源自人類知覺的視野結構的傳統二元論，即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明顯區別——一方面處於生活中心的家庭，人際關係和家庭經濟，另一方面則是集市和廣場的世界，法律的世界和政治的世界，乃至戰爭的世界。因此，歷史既涵蓋了權力的實用主義的

關注，也包含了對趣聞軼事的興趣——從要事到瑣事、從高貴的（或低劣的）政治到低下的（或高貴的）文化。這樣，歷史的興趣涵蓋搖籃到墳墓，是一個完整的周期，從家庭生活一直擴展到探險和殖民可及之處，局限只存在於後發之中——材料的可理解性以及歷史學家的想像力之中。

德國學者耶格爾（Friedrich Jaeger）在《德國歷史中的記憶文化》（*The Memory Culture History of the Germany*）中指出，歷史意識並非只瞄向過去，歷史恰恰是為了未來而回顧往事。“歷史”這個意義構造物具有人的時間意識的雙重意向延伸，一是經歷和期待的延伸，一是保留和要求的延伸。通過歷史的意義形成的心理實踐，即歷史的敘述，過去就獲得向未來邁進的當前歷史的這個特性。只有當敘述把在過去形成的體驗這樣展現出來，使之在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現實關聯中與當前結合在一起時，它才是歷史的，才能通過對過去的體驗的解說，實現時間定向的特殊功能。經過這樣的歷史，傳統被傳授下來，或者繼續發生效力，或者受到批判。

當代西方學者對歷史和歷史學的重新思考，並非故作深沉，恰恰相反，它是有感而發的，反映了近年來史學理論的前沿探索，對於我們或許不無啟迪。

歷史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學科，可以說

自從有了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便有了歷史學。商朝甲骨文中就有“史”字，其字形彷彿人手握筆記事。這個“史”，就是商朝專門掌管祭祀和記事的官員，即所謂史官。以後，西周時的太史、內史，春秋時的外史、左史、南史，都是專掌記事的史官。正如《禮記·玉藻》所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史官們為後人留下了歷史記錄或歷史著作。孔子說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本意就是說他一生只整理歷史而不創作，《詩》、《書》、《禮》、《樂》、《易》、《春秋》，便是孔子學習和整理歷史的產物，也是孔門講學的教材。其中最具歷史學意味的著作當推《春秋》，它是孔子依據當時魯國史官所編《春秋》加以整理修訂而成的一本春秋時代的編年史，成為後世編年史的濫觴。當《春秋》由“史”升格為“經”以後，又派生出注釋《春秋》的“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大大豐富了這部春秋時代編年史的內涵。

西漢時司馬遷所寫的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出現後，中國的歷史學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史學成為顯學，蔚為大觀。從此連綿不絕，留下了號稱“汗牛充棟”的歷史著作，其規模之宏大、品種之豐富、卷帙之浩繁、銜接之緊密，在世界文明史上絕無僅有。每個中國人應該為此而感到慶幸

和榮耀。

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在當代中國，歷史學受到了空前的冷落，社會上出現了輕視與鄙薄歷史的風氣。在“高考指揮棒”的影響下，中學教育中，歷史久已成為一門不被重視的課程。大學的情況也不容樂觀。以復旦大學論，只有文史哲三系有中國歷史課程，其他各系均付闕如。這與半個世紀前，中國通史是大學一年級（不分文理科）必修課的狀況，不可同日而語。難道隨着科學技術現代化，人們就可以不必學歷史了？非也！

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在新聞傳媒（報刊、廣播、電視等）中，缺乏歷史素養的知識性錯誤比比皆是，已經成了有識之士無法容忍的“公害”。滬上一家大報，竟然堂而皇之誤導讀者：北宋的徽宗、欽宗死於漠北。實在令人驚詫莫名！徽欽二帝的死地五國城，即今黑龍江依蘭縣，與“漠北”（蒙古）風馬牛不相及。一些政府官員、企事業負責人出於對歷史的輕視或無知，已經或正在製造一起又一起“建設性破壞”，毫無顧忌地拆毀、摧殘文物古蹟、近代優秀建築。作家馮驥才十分感慨地對記者發表談話：“我們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文化遺存，正經歷着一場大規模的一次性破壞，這種破壞與‘文革’中不一樣，‘文革’時是當作‘壞’的東西惡狠狠地破壞，現在是當作‘舊’的

東西，用新的、更美好的東西替代，是樂呵呵地破壞。”

輕視歷史所帶來的惡果，或者說是對社會的一種懲罰，現在已經屢見不鮮了。在一個有着悠久歷史傳統的國度裡，輕視歷史實在是不可思議的！

更加使人感到憂患的是，大批在外國大學留學的中國學子，當外國學者與之談起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時，居然一問三不知。“數典忘祖”在這批未來的學界精英身上，已經不再是一個形容詞，而是一個嚴酷的現實。這種不正常狀況，難道還不值得有關方面深刻反省嗎？

輕視歷史，不僅意味着數典忘祖，而且意味着否定自身存在的價值。因為現在正發生的一切，即將成為歷史，而載入史冊。如果我們的後人也以輕視歷史的態度來對待我們這個時代，那麼我們這一代人所作出的艱苦卓絕的貢獻，就將變得毫無意義。

凱利在《多面的歷史》中說，歷史學家最後所面臨的是歷史的目的性問題：研究往昔的益處何在？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有關這種問題的各種答案一直在不斷出現。歷史保存或銘記了那些重大事件和人物，尤其是民族傳統中重大的事件和人物，因此它

是譜系學的一種比喻形式的具體體現。與這種狹隘的關注主題相分離的是，歷史需要一種說教功能作為特別的道德或政治教訓資源。但是，更應強調的是，歷史是一種自知的形式，或者說是探尋自知的形式，它不滿意於狹隘的“滿意”，並且不期待具體問題的答案。它是一種智慧形式，即是一種在時間上拓展人類視野並超越地方經驗和注意力的一種形式。在這種程度上，歷史將始終成為人類生存環境的一個組成部份。這話說得多麼精彩！

歷史給人以智慧，教人以具有歷史縱深感的深邃眼光去看待過去、現在、將來，而不被眼前方寸之地所局限，不至於成為鼠目寸光的庸碌之輩。只有深刻地認識過去，才能理解現在發生的一切，才有助於選擇一條正確前進的道路，才能展望美好的未來。歷史並不是一些人眼中所謂“老古董”。歷史是常學常新的。歷史學家的職責並非簡單地復原歷史，而是對歷史不斷作出新的解釋，為當代人提供足資借鑒的“鏡子”，或一種考慮全局、展望未來的思路。從這個意義上講，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實在是意味深長的。

46. 唐太宗與貞觀之治

建立唐朝的李淵，是西魏貴族李虎之孫，本人又世襲唐國公，他憑藉自己的政治優勢，利用隋末動亂的形勢，取而代之，重建新朝。西魏宇文泰創府兵制時，最高軍事長官有八柱國、十二大將軍，楊堅父楊忠為十二大將軍之一，李淵祖父李虎是八柱國之一。而且這三者透過突厥望族獨孤信維繫着一種聯姻關係：獨孤信的大女兒嫁給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明帝），四女兒嫁給了李虎之子李昉，七女兒嫁給了楊忠之子楊堅（即隋文帝）。李淵透過其母獨孤氏，與北周及隋兩家皇室有着緊密的關係。所以李淵的取代隋，猶如楊堅的取代北周，是貴族政治的產物。

李淵世襲唐國公，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任太原留守（指揮部設在晉陽），執掌軍政大權。次年，他見隋已無可挽救，便率部從太原起兵，南下佔據長安及渭水一帶。這就是歷史上所謂太原起兵（或晉陽起兵）。舊史所說，李世民暗中在晉陽部署賓客，準備起兵，而李淵不知此事，等到李世民以計劃相告，李淵大為驚駭，甚至要執李世民送朝廷治罪，不足為信。由於李世民是殺兄逼父取得帝位，不合乎倫理，即位後便致力於修改國史，為自己辯護，御用文人把太原起兵時的李淵寫成無所作為，李世民成

了唐朝的締造者。其實李淵決不是庸碌之輩，而是一個有政治遠見和軍事才能的開國君主。

李淵從太原起兵到佔領長安、關中，僅120天，一個重要原因是隋朝主力軍被起義軍吸引在東方，關中兵力空虛。為了把貴族團聚到自己的旗幟下，李淵暫時捧出隋煬帝的孫子作傀儡，以掩人耳目。進入長安後，李淵迎代王侑即皇帝位，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李淵則成為事實上的皇帝。在貴族政治時代，他的這種策略很容易奏效：“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兄弟老幼，相攜來者如市。”第二年（公元618年），隋煬帝被處死，李淵便正式稱帝，建立了以自己的封號唐國公命名的唐朝。李淵是建立唐朝在先，兼併各割據勢力在後，唐朝實際上並不是作為隋朝的對立面出現的，而是作為其繼承者出現的。

新王朝的首要任務是建立一統之基，在這一過程中，李淵之子李世民起了重要作用。

唐高祖李淵的皇后竇氏生有四子，三子李元霸早死；長子李建成通常留居長安，協助高祖處理軍國大事；次子秦王李世民領兵出征，統一全國。隨着李世民在征戰中屢建功勳，威望日增，李世民與李建成兄弟二人

爭奪皇位的鬥爭日趨明朗化。在這場鬥爭中，四子齊王李元吉一直站在李建成一邊。

李建成與李元吉企圖除掉李世民，高祖同意這一預謀，由於軍事行動未停，不便下手。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加劇了預謀活動，想以李元吉做出征元帥，削奪李世民的兵權，然後除去李世民。李世民獲悉後，與他的親密顧問、內兄（妻兄）長孫無忌等人商量，採取先發制人的對策，發動玄武門之變（因發生在長安宮城北門玄武門，故稱“玄武門之變”）。李世民親自用弓箭射死了李建成，李元吉則死於埋伏之手，他們二人的兒子也都牽連被殺。到了葬禮之日，李世民卻假惺惺地痛哭流涕。政治鬥爭的險惡，政治家的虛偽，於此可見一斑。殺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立自己為太子。兩個月後，唐高祖可能是由於被脅迫而放棄皇位，李世民成了唐朝第二個皇帝——唐太宗，改年號為貞觀，唐高祖被尊為太上皇。

唐太宗即位後，鑒於隋亡於暴政的教訓，採取與民休息，不得罪民眾的明智政策，這是取得為史家所稱道的“貞觀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成為歷史上屈指可數的英明君主的根本原因。他一即位就聲明，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他對隋亡引為鑒戒，他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

用，誠可畏也”；“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讀dàn）腹，腹飽而身斃”。他的謀士魏徵（諫議大夫）認為，大亂以後可致大治，民眾遭戰亂之苦，教化容易奏效。唐太宗根據魏徵的政治見解，偃武修文，使政治安定，百姓樂業。貞觀時期君臣的納諫和直諫，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良好政治風氣，唐太宗以隋煬帝拒諫飾非為鑒，虛懷博納，從諫如流，大臣們多能直言極諫，面折廷諍。魏徵向他諫



唐太宗李世民

諍二百多次，言辭尖銳，直言無忌，每每觸犯龍顏，都被唐太宗優容，這種肝膽相照的君臣關係令人不可思議。正是在這種良好的政治氛圍中，唐太宗與他的大臣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蕭瑀、褚遂良、李靖、李世勣，聯手締造了持續二三十年的太平盛世——貞觀之治（公元627年～公元649年）。這一政績記錄於《貞觀政要》一書，它摘編了貞觀年間太宗與大臣的政論，讚頌太宗的德政和治術，告誡後人“克遵前軌，擇善而從”。

唐太宗在太祖創業的基礎上，強化王朝的制度建設。

（一）加強官僚機構，提高政治效能

唐承隋制，中央設三省六部。全國軍政大權集中於三省，皇帝頒佈政令，需要通過中書省和門下省付署才算合法。凡國家大政方針，先由中書省研究，作出決定；再由門下省審核，如有差失，可以駁回；尚書省下轄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執行中書省和門下省通過的政令。中央政府設立政事堂，作為宰相的議事機構，一切重大事務，包括五品以上官員的任免，都要由政事堂會議討論，經皇帝批准後頒行。三省的首長：中書令（中書省）、侍中（門下省）、左右僕射（尚書省），都是宰相，以後凡參加政事堂會議的其他官員也是宰相，他們都帶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等銜，所以參加政事堂

會議的宰相多至一二十人。錢穆在《國史新論》中說：“漢代宰相是首長制，唐代宰相是委員制。最高議事機關稱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須用皇帝詔書名義頒佈者，事先由政事堂開會議決，送進皇宮劃一敕字，然後由政事堂蓋印中書門下之章發下。沒有政事堂蓋印，即算不得詔書，在法律上沒有合法地位……在唐代，凡遇軍國大事，照例先由中書省中書舍人（中書省屬官）各擬意見（五花判事），再由宰相（中書省）審核裁定，送經皇帝畫敕後，再須送門下省，由給事中（門下省屬官）一番複審，若門下省不同意，還得退回重擬。因此必得中書、門下兩省共同認可，那道敕書才算合法……皇帝不能獨裁，宰相同樣不能獨裁。”這是很獨到的見解。唐代中央官制的特點在於相權較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專制；又因宰相是政事堂集體議事，三省又互相牽制，避免了個別宰相專權。

監察機關是御史台，長官是御史大夫，糾察內外百官軍民。御史台與刑部（司法行政機構）、大理寺（最高審判機構），合稱三司。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會同刑部尚書和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即後世“三法司”會審的前身。

地方行政機構也沿襲隋制，分州縣兩級，共三百餘州，一千五百餘縣。唐太宗為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把全國分為十個監察



《唐律》殘片

區，即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道不是一個新的行政單位，沒有常設機構和常任官員，只是便於皇帝派出觀察使不定期地視察道內各州地方行政工作的巡行區或監察區，與漢朝的刺史部約略相當。

（二）重視官員的培養與選拔 唐太宗注意按照“才行兼備”的標準選用官員，而不拘關係的親疏和資格的深淺，科舉制度正在逐漸衝破傳統的貴族政治格局。貞觀元年，唐太宗“盛開選舉”，此後又通過科舉考試選取才士。常舉的科目有秀才、進士、

明經、明法、明書、明算等6科。明法、明書、明算是關於法律、書法、算學的專門科目，取士有限，而且難以進入政界；秀才科須高才博學的人才能應考，唐太宗時此科幾乎瀕於廢除；真正成為常舉科目的，是明經與進士兩科。明經科主要考帖經、經義及時務策；進士科主要考時務策、經義，唐高宗時加試雜文（詩賦），至玄宗時改為考詩賦為主。進士科日益受到重視，大官多出身於進士科，故多擅長詩賦文章。《唐摭言》說：“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

不為美。”貞觀晚年，唐太宗擴大進士科，提高了進士的進身之階，起到了推動作用。唐人趙嘏有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反映了進士科登第之難。士子考取進士後，還需由吏部複試，複試合格，才可授官充當州縣長官的幕僚，或經朝官推薦，以候補官員的資格正式入仕。

科舉考試的發展與健全，是歷史的進步。它原則上規定，除了宮戶、部曲、雜戶等賤民階層，一般平民都可以參加考試，這就改變了魏晉以來州郡中正官壟斷選士的狀況，把選人、用人權收歸中央，打破了士族門閥把持政權的局面，它為才士開闢了入仕的途徑。唐太宗在金殿端門看到新進士魚貫

而出的盛況時，情不自禁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儘管當時科舉考試仍然講究門第，但隨着考試制度推行日久，平民社會的清寒子弟，棲身僧寺，十年寒窗，也可躍登上第。

唐朝用人，並不全憑考試，仍有學校出身一途。在唐太宗的重視下，學校教育制度逐漸完備。國子監作為全國最高學府，下設6種學校：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前3種學校接納三品、五品、七品以上的官僚子弟入學；後3種學校接納八品以下的官吏子弟及平民子弟。此外還有弘文館、崇文館，專門招收皇親國戚、高級官僚子弟入學。地方則有州縣學。各級學校都以儒家經典作為必讀教科書，學習成績優良者，送往吏部參加科舉考試。貞觀時期教育發展，文治勃興，杜佑《通典》如此寫道：“貞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一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句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三）完善寬簡的法制建設 武德元年，唐高祖鑒於隋煬帝法煩刑苛導致的嚴重後果，宣佈廢除《大業律令》，命大臣依照《開皇律》重修訂新法，於武德七年（公元

624年）頒佈以寬簡為原則的《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後，多次組織名臣研究立法的方針，並採納魏徵的建議，確立寬仁、慎刑的宗旨，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修訂法律，經過10年，於貞觀十年（公元637年）正式公佈《唐律》（即貞觀律）500條，基本內容有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廩庫、擅興、賊盜、鬥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等。唐高宗時，由長孫無忌領銜，對唐律條文加以注疏，編成《唐律疏議》12編30卷，對當時高句麗、日本、安南等國有重大影響，也是宋、明各朝法典的範本。

唐律體現了唐太宗再三強調的法律的劃一性、穩定性、簡約性，以死刑條目為例，比前朝法律幾乎刪減了一半，也比號稱“寬簡”的《開皇律》更為寬簡，減斬刑為流刑92條，減流刑為徒刑71條，還廢除了鞭背酷刑與斷趾等肉刑。斷獄律還規定，徒刑以上罪斷案後犯者不服，可以提出再審，死罪要經三覆奏，三日後才可執行。據說，貞觀

四年全國斷死刑才29人。法簡刑輕，往往是太平盛世的一個標誌。貞觀一代，君臣上下守法成風，出現了治世，《貞觀政要》說：“……由是官更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佈野，外戶不閉。”

由於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政治清明，社會安定，貞觀二三十年間，出現了天下大治的盛況。《新唐書》說：“至四年，斗米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資糧，民物蕃息。”《通典》說：“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為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斗米四五錢，馬牛佈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值兩錢。”

西方漢學家對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向來貶多褒少，惟獨對於唐太宗是一致恭維。原因在於當時中世紀歐洲已進入了所謂“黑暗時代”，而貞觀之治所體現的政治體系及其效率，當日世界上堪稱獨一無二。

47.從武則天到唐玄宗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為安排他的接班人而煞費苦心，終不能如意。太宗的長孫皇后生三子：長子承乾有足疾，第九子晉王治軟弱無能，太宗都不滿意；第四子魏王泰愛好文學，深得太宗寵愛。魏王泰謀作皇統繼承

人，承乾力圖保持太子地位，矛盾尖銳化。後來承乾以“謀反”被廢，太宗雖不滿意晉王治軟弱無能，但不得不立他為太子。因為魏王泰圖謀奪太子位，如立他恐為後世倣效。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治繼



三彩文武官俑